

新时期年鉴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

潘捷军*

摘要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中国年鉴事业起步,伴随着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年鉴编纂实践,相应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也随之展开并渐趋深化。在对年鉴发展史进行系统梳理的同时,学术界分别就年鉴性质、功能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年鉴学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业界还就这一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年鉴实践和学科建设后续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关键词 年鉴事业 理论研究 学科建设 学术综述 年鉴研究

在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年鉴事业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历来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笔者以《中国年鉴研究》等为主平台,对长期以来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综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述“新时期”,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两轮修志期(即1981—2000年,2001—2020年并延续至今),年鉴事业发展过程自然也包含在其中。但客观上所谓“首轮”“第二轮”似更适合以“20年左右编修一次”的修志工作,年鉴则更为强调“一年一鉴”的年度约束,故笔者不以“两轮修志期”为题而多以“新时期”加以指代。

一、年鉴发展史研究梳理

中国年鉴事业虽起步于近代,但对其进行研究却主要始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经查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中国地方志论文论著索引(1913—2007)》,其中涉及“地方年鉴”的成果几乎均作于20世纪80年代后,故以下所引成果也多源于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

(一) 中国年鉴发展史的学术考察

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作为规范形式的年鉴,主要系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因而相应

* 潘捷军,男,浙江省平湖市人,中国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方志学等。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近现代方志学术史研究”前期成果(项目编号:2021C2D01)。

可从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经过和国外年鉴的影响两方面来考察这一历程。

1. 中国年鉴事业进程与基本特征

一般认为,中国年鉴事业起步于清末民初。如肖东发指出:“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年鉴事业的草创时期。”^①牟国义在考察了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年鉴编纂活动后,进一步指出:“我国自主编纂年鉴的历史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07年可视为我国政府主持编纂年鉴活动的元年,是中国年鉴事业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开端和起点。”^②

运子微进一步分析了晚清以统计年鉴为主要特征的国外年鉴传入后,“中国年鉴出版事业创始人”卢靖的最早觉醒。指出卢靖的“统计年鉴者,合世界万有之现象,条理而贯串之,放之则弥六合”等观点,是“对年鉴功能及实用价值的最朴实、最为直观的认识”,进而在“外来文化的认同之下,对于本土的落后自闭的思想意识给予尖锐批评,为年鉴落根于本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③

牟国义还对中国年鉴事业的纵向发展脉络作了总体梳理:一是北宋已现“年鉴”一词及相关文献,但多限于记录阴阳五行等现象,与后世规范年鉴并无关联。且其时文献多已散佚无存,其“年鉴”本义自然难考。二是以1852年英人出版的《上海年鉴》(“通书”)等为标志,年鉴开始传入中国。其后则以西方年鉴类文献编译为重点,其中“卢靖、谢荫昌等人的贡献在中国年鉴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三是从1912—1949年,以《江苏年鉴(未完稿)》和《世界年鉴》等为起始点,系中国“年鉴编纂的创始期”,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民国年鉴类文献就有近千种。四是新中国的年鉴事业“经历了一个由低谷到高潮、从中断到大踏步前进的过程”,其中1979—2005年为兴盛期,2005年后为繁荣期,并实现了从“依法编鉴”向“依法治鉴”的重大转变。^④这一阶段划分和相应概述应当也是年鉴界的基本共识。

2. 对民国年鉴事业的重点关注

正因为民国系中国年鉴编纂的创始期,因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例如,有学者先后梳理了民国年鉴编纂的基本情况后认为,20世纪30年代,我国曾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年鉴热”,此后至1949年,共编纂出版了包括综合性、专科性、地方性和统计性4种类型在内的80多种年鉴。但不同研究的统计口径和相应数据又有不同。如肖东发等在《中国年鉴概览》一书中,统计民国各种年鉴为207种。而据王燕亭等对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统计,民国各种年鉴类书刊更是多达952种,包括年刊479种、年报280种和年鉴193种。相关研究还介绍了时任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提出解散方志旧体,分编年鉴、专门调查和省史三书的建议,以及瞿宣颖、黎锦熙等与之争辩的历史情况和《上海市年鉴》等年鉴编纂实践

① 肖东发等:《年鉴学》,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② 牟国义:《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年鉴编纂活动考察》,《中国年鉴研究》2017年第1期。

③ 运子微:《我国早期年鉴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年第6期。

④ 牟国义:《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的回顾与总结》,冀祥德主编:《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方志出版社,2017年,第3~20页。

后,着重指出:“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不少地方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出版,许多地方的修志机构开始编辑出版年鉴,此举被誉为是‘两届修志中间的最佳选择’,但追根溯源,其开拓之功却属于民国志家学者。”^①这应是对民国年鉴地位的客观评价。

从初始阶段看,牟国义对北洋政府年鉴编纂活动的考察颇具深度。文章首先指出,自民国肇兴,在经西方传教士引进、晚清官办翻译机构和民办报刊编译等阶段后,“被清末预备立宪视为‘宪政之初基’‘开宗之先务’的统计调查和年鉴编纂,顺理成章地承袭下来”,从而使近代中国年鉴发展正式进入了创始阶段。在此背景下,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涉及年鉴编纂的法令,以国务院(政事堂)、内务部、财政部等为代表,在一批统计学者参与下,以编辑“财政经济年鉴”和我国第一部中央级专业年鉴《外交年鉴》等为重点亮点,开始进行各类年鉴的编纂尝试,并在机构设置、统计方式、调查内容,尤其是编纂体例等方面有诸多创制。作者认为,“尽管时局多变、举步维艰,大规模筹办全国性年鉴的计划在短时期内未见成效,但作为政府的法定职能,持续不懈的统计调查和努力,催生了《观象岁书》《外交年鉴》《江苏省政治年鉴》等一批数量可观的编纂成果”。同时还在完善统计调查内容和改进制度设计、探索新编纂体例以及注重人才培养等方面有诸多“改良之策”,从而“既为后来国民政府最高统计机关主计处的设立提供了体制上的镜鉴,也为国民政府《统计法》的制订出台和年鉴编纂正式立法作了法制上的铺垫”。作者还特别强调:“民初对‘年鉴’的认知与表述有别于今天对年鉴概念的理解。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对‘统计’与‘年鉴’两者关系的认识问题上。”即“清末预备立宪以来,‘统计’与‘年鉴’在认识上开始发生转换……‘年鉴’一词悄然演变为‘统计’或‘统计年鉴’概念的同义词”,包括“‘年报’‘年刊’之名刊行的各种统计资料和年度资料汇编,也应纳入‘年鉴’范畴”,等等,从而意在强调“北洋政府对清末年鉴编纂旧制的承袭并非简单的复制,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彰显出时代转换的进步意义”。^②

从具体区域看,徐鹏以浙江为例所作的专题研究同样较具典型意义。作者统计了自1922年始,浙江所编纂的10种13部综合性、地方性、专科性和统计性年鉴,并指出其时年鉴编纂虽“属初创与上升阶段”,但“专注于微观层面的区域性成果乏善可陈”。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阐述了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民国年鉴编纂的特点有“所引资料翔实新颖”,“统计图表成为呈现内容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以现代学术知识记载自然和社会现象”和“年鉴编纂理论初见端倪”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在编纂连续性、资料年度性、结构合理性、检索工具性和编排严谨性等诸多不足,并认为其时“地方年鉴的内容、体例,尚未摆脱地方志的痕迹”^③。从中也可洞见全国年鉴的编纂状况。另外,陈鸿在相关研究中,则介绍了上海市年鉴委员会的成立及相关工作,指出其能充分认识“年鉴之效能,在学术上为研究比较之资料,在行政上起老绩更新之作用”。同时介绍了其在通志馆完成

① 邱新立:《民国时期改造旧志的主张》,《江苏地方志》2013年第12期。

② 牟国义:《承袭与创制: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年鉴编纂研究》,《中国年鉴研究》2022年第1期。

③ 徐鹏:《民国时期浙江年鉴编纂出版述略》,《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7期。

修志任务撤销后,还“能以此机构继续发展下去,从事上海市的研究”。^①这种对志鉴互促互补辩证关系的认识,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

(二) 国外年鉴的借鉴研究

由于年鉴是近代西方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因而其对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深具影响,同时也历来是年鉴学界的关注重点。

1. 对国外年鉴事业发展过程的考察

首先,孙关龙在相关研究中借鉴1990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指出,经长期发展,西方年鉴主要形成了三种形式:Almanac、Yearbook和Annual。并相应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初始阶段(16世纪—1731年),以英国为中心,主要来源于记录气象并借此进行祭祀、占卜等的历书,并强调了古代社会(或农业社会)需要历书、近代社会(或工业社会)需要年鉴的演进关系。二是形成阶段(1732—1867年),其主要特点是已逐渐脱离历书影响且呈现数量增加、范围拓展等特点。三是发展阶段(1868—1979年),相应具有质量提升、产品系列化和中心向美国转移等趋势。四是多元化阶段(1980年以来),主要具有亚洲崛起、研究深入、现代化手段广泛运用等新特征。^②

杨永成的研究则重点考察了“17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及西方国家在海外进行殖民与经济扩张,年鉴开始走出英国与欧洲,在全球多国及地区得到传播应用”的历程。其中传入日本后被定名为“年鉴”,继而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又影响至中国,包括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于上海的“通书”类综合年鉴和《上海年鉴》等,均是这种影响传播的产物。同时,还肯定了它们在传播文化知识和促使国人开眼看世界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意义。^③张艳茹则考察了日本从早期“政表”到成熟“年鉴”的发展过程,认为两者虽“名称不同,但实质是相近的,只是随着编纂水平的提高,年鉴相比政表条目设置增多,调查手段、统计方法更为科学”。^④

2. 国外年鉴对中国年鉴事业的启示借鉴

在关注世界年鉴史发展过程基础上,学术界还从不同层面重点考察了其对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是对国外年鉴传入中国过程的多视角考察。如运子微同样从年鉴与统计的关系角度注意到:“严格地讲,当时进入中国的年鉴多属于统计类年鉴,以分门别类刊载年度统计数据资料为其内容主体,数据资料的特点是可以直观地表示事物的发展规律、趋势、优劣状况等,通过对数据资料的鉴别比较,可以启发心智,开拓思路,知己知彼。这样促使关注者调整思路,试图以中外国情比较的方式,从中找寻解‘中国之优劣差同之病痛的良

① 陈鸿:《上海市通志馆的发展变迁及其运作》,《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8期。

② 孙关龙:《年鉴与地方志的比较研究》,《年鉴信息与研究》2008年第6期。

③ 杨永成:《15—19世纪英国年鉴的演变发展及其在世界的传播》,《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1期。

④ 张艳茹:《日本年鉴的产生与早期发展》,冀祥德主编:《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9—2020)》,方志出版社,2020年,第449~458页。

方’”^①。张艳茹则在上述研究中,还深刻阐述了日本年鉴传入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在中国、朝鲜等地的官方、半官方侵略机构、团体编纂出版了大量年鉴,编纂这些年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搜集情报资料,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政治性十分鲜明。”从而揭示了日本向中国传输年鉴的另一战略意图,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警示意义。

二是从不同侧面对国外年鉴基本特征的解读。例如,王师师通过对欧美等西方主要年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举例,将其概括为选材具有国际视野、内容极具实用性、数据关注延续性、注重编者读者双向互动、衍生读物迎合市场需求、出版周期短且发行量大等9方面特点。^②姜原从出版发行(出版方多为政府机构、出版时效性强、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框架结构(结构较完备、个性化特征明显、栏目排序随意)、选材(视野开阔、突出特色、侧重社会生活、纵横立体式收录数据)和内容编写(文风花哨、不受时限约束、注重编读互动、图表丰富等)4个方面,解析了当今国外年鉴的主要特征。^③王韧洁则从体例构建(条目体、文章体、大事记体例)、内容编纂(精致细化、实用强、时间及地域范围宽泛、富有主观色彩、不回避负面信息)、组织运营(主办方、信息收集和宣传推广三方面的多元性)、网络创建和外在形式等方面,对国外年鉴的主要特点作了集中概括。^④这些研究的迭加综合,基本反映了现代国外年鉴的总体特征。

三是在上述基础上对国外年鉴启示借鉴意义的分析。例如,杨永成认为,在西方三种年鉴模式中,Almanac系大众年鉴,Yearbook和Annual多为专业年鉴,而“与社会结合最广泛、最紧密的便是大众年鉴”,其“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实用性、可读性以及在使用上的方便性”^⑤。同样,陈洪泉通过对中美日三国年鉴的比较分析认为:“美国年鉴科普性、大众化、可读性强;日本年鉴资料性与数据性强,特别是表格类别比较多,读者抓取信息方便。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大多数中国年鉴给读者的感觉是不贴近大众,可读性差。”并相应提出,应将原有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单一供稿渠道改为社会多源供稿,尤其要增加公众喜闻乐见的服务性甚至趣味性内容。^⑥简而言之,众多研究就西方年鉴对中国年鉴事业所概括的主要启示在于:如何从“小众”走向“大众”,其中既包括对应侧重于政府还是应倾向于民众即年鉴性质的定位,更包括从内容到形式等大量编纂出版业务的创新,其借鉴意义不言而喻。

同时难能可贵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年鉴学界虽十分注重通过借鉴来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但并非一味照抄照搬甚至食洋不化。如陈洪泉在上述研究中指出:并非“中国年鉴不

① 运子微:《我国早期年鉴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王师师:《国外传统代表性年鉴发展趋势及特点》,《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0期。

③ 姜原:《国外年鉴特征辨析及启示》,《中国年鉴研究》2021年第1期。

④ 王韧洁:《国外年鉴特点述论》,《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4期。

⑤ 杨永成:《西方大众年鉴的编纂模式》,《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方志出版社,2017年,第348~359页。

⑥ 陈洪泉:《中美日年鉴对比与启示》,《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3期。

如美日年鉴。美日年鉴也有很多不足,如一些美国年鉴为了增强猎奇度,取悦读者,内容过于宽泛且实效性不强……日本年鉴很多只注重资料的搜集,不注重总结,没有整体概括的记述,很零散,使读者研究起来劳累伤神。从采用的资料和数据来看,中国年鉴的权威性更高”。同样,李国新则以日本为例,在考察了中国年鉴“走出去”的现状后指出:“有一点值得年鉴人自豪:在国外,一般来说,只要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地方,只要是收藏中国文献的地方,就有中国年鉴”,而且“规模不论大小、领域不论广狭、层次不论高低,各种类型的年鉴都有‘走出去’的可能”。^①这种理念和方法对如何增强文化自信,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事业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三)其他行业对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影响

百余年来,中国年鉴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在专业上受到了西方年鉴的主要影响,同时还受到来自其他行业的不同影响,它们同样是助力年鉴事业发展的积极因素。

首先,陈郑云着重研究了“近代报刊对年鉴发展的影响”。作者列举大量实例,通过相关报刊围绕年鉴从源流性质到体例方法等问题开展的一系列讨论,说明“近代报刊是年鉴编纂研讨的重要阵地”;通过报刊发布征稿通知、通报编纂动态和综述编纂得失,介绍“近代报刊是年鉴编纂进度的公告窗口”;通过报刊开办批评栏目、刊发客观介绍情况的推销广告,强调“近代报刊是年鉴批评的重要园地”。^②与新闻传媒业相比,年鉴显然属于“小众产品”,因而近代报刊业在对年鉴事业的助推作用方面功不可没。

其次,肖东发重点关注了现代图书馆事业对年鉴工作的发展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前,因各大图书馆所藏历史文献较为丰富,所以广大读者到图书馆查找历史资料并不困难,“惟独查找现当代的人物传记、机构名录、法规文献、统计数字,反倒十分困难。原因就是缺少反映现实进展的工具书。有时只好利用国外年鉴查找有关中国的资料”。作者率领团队在对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及北大、清华、人大等在京高校调研中发现,广大读者对年鉴需求速增,但又往往困于其体量大、价格高且发行量小等因素。以北京图书馆为例,1990年前该馆因中文年鉴缺藏现象严重而受到读者批评。为此他们改变坐等上门的老办法,仅一年中,便深入各书店和出版社,并向约100家年鉴编辑单位发函,下苦功将所缺年鉴一一补上。同时实行读者推荐制,即读者所需年鉴而北京图书馆缺藏的即设法补购。经过努力,馆藏年鉴达到了850多种,约占其时全国出版总量的80%。^③可见图书馆的积极作为客观上同样推动了年鉴事业的持续发展。

再次,陈颖以“皮书发展对年鉴工作的启示”为题进行了研究。“皮书”因封皮多为蓝色又称“蓝皮书”,“是关于某一领域、门类或地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资讯类连续出版物”,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权威发布平台,成为各级政府决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

^① 李国新:《中国年鉴在日本——兼论中国年鉴的国际化》,《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陈郑云:《近代报刊对年鉴发展的影响》,《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1期。

^③ 肖东发:《图书馆对年鉴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利用(上)》,《图书馆学研究》1998年第1期。

书系”。作者着重指出,因年鉴与皮书有诸多相似之处,故可加以借鉴。如“年鉴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资料的权威性和全面性,这是任何图书形式所无法替代的,也是其作为工具书、资料书的价值所在”。但目前不同程度“存在官话多、套话多,实情少、分析少;重复多、文字多,数据少、图表少;字数多、部头大,定价高、价值低等问题”。而反观皮书因定位于“评估现状、分析问题、预测发展、提供建议”,其“亮点是专家学者进行的问题分析和发展预测,故有很高的含金量”,同时其复制率须在15%以下,每篇文章必系首发等做法都很值得借鉴。作者进而提出了年鉴虽以“编”为主,但并不妨碍可有“著”的成分,以及增加“主题原创”等富有见地的建议。^①

最后,对百科全书与年鉴的比较研究同样值得关注。从一定意义上看,“年鉴与百科全书最为密切,相同之点最多”^②。孙长青指出,百科全书(encyclopedia)“是一种以对已有知识进行整理和分类为目的,概要介绍全部或某一特定领域或学科的知识”的书籍”,而“年鉴通常被认为是编制百科全书的基本信息源,有‘微型百科全书’之称”,而且因年鉴借鉴了百科全书的“条目”形式,尤其“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更像是借鉴了百科全书的记述形式”,故该研究“反弹琵琶”,认为“只有搞清楚百科全书编纂的原理,理清年鉴与百科全书的异同,才可以准确找到年鉴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切入点”。^③ 这同样是一种另辟蹊径的研究视角。

二、若干重要问题研析

与地方志一样,年鉴既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同时也是具有自身独特规律的一门学科,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故业界向来十分关注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

(一) 对一些基础性重要问题的关注

在长期实践中,业界多意识到,一些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既是影响实践发展的要素,也是学科构建的重要基础。

例如,在对年鉴性质的认识上,长期以来有“百科全书”说、“工具书”说和方志“年度资料性文献说”等不同说法,但主要聚焦于后两种。如肖东发在《年鉴学刍议》一文中即认为,“首先应该肯定年鉴是工具书”,而且是“资料性工具书”(这也是其时业界的基本共识)。同时就有学者“对年鉴属于工具书这一基本问题总抱有一种怀疑态度,持保留意见”的认识,作者进一步阐释:工具书有十几种类型,未必都属于辞书类,而“年鉴不仅具有一般工具书所共有的收录广泛,内容概括、编排特殊,专供查阅等特点,还有资料翔实,反映及时,连续出版等特点。即不但有完整性、概括性、系统性、易检性,还有资料性、年度性和连续性”等特点。^④ 肖东发等以图表方式详细对各类工具书作了区分(如下),从而既阐

① 陈颖:《试论皮书发展对年鉴工作的启示》,《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2期。

② 肖东发等:《年鉴学》,第70页。

③ 孙长青:《地方综合年鉴与百科全书的比较研究》,《上海地方志》2020年第2期。

④ 肖东发:《年鉴学刍议》,《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

述了年鉴的基本特点,实际又为其从当初的“工具书”说向其后的“年度性资料性文献”说作了初步铺垫。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年鉴“年度资料性文献”的定论已成为业界的基本共识。

表 1 工具书类型一览表

性 质	类 型
百科性工具书	百科全书(包括百科辞典)类书、政书
资料性工具书	年鉴、手册
表谱性工具书	历表、年表
图录性工具书	地图、图谱
辞书性工具书	字典、辞典
线索性工具书	书目、文摘

资料来源:肖东发、陈慧杰:《论年鉴学研究体系的建立》,《辞书研究》1986年第6期。

不过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就年鉴性质问题提出了第三种意见,认为“《地方志工作条例》只对地方综合年鉴作出定义,并没有对年鉴下定义。地方综合年鉴只是年鉴中的一类”。“相当多的论文将地方综合年鉴的定义视同为年鉴定义,将其作为‘资料性文献观点’的代表性定义来与‘工具书观点’的定义相比较”,殊不知两者在记录方法、内容、范围、本质特征上并不一致。“那么,由定义(定性)出发的编纂组织形式、资料收集范围、体例体裁、框架结构、撰写方法等自然就大相径庭。”^①这种将“年鉴”与“综合年鉴”加以区分的认识,可能是一个既具独特视野同时也更需进一步辨析的问题。

又如,与年鉴性质相应,年鉴功能也是关注度很高的话题。据研究,与志书“存史、育人、资政”的功能一样,除传统的“三功能”外,年鉴还有从单项(“存史”)到四项、五项、七项以至九项等多种不同说法,但重点仍多聚焦在“官书”还是“民鉴”(即如何看待资政功能)的关系辨析上,其他功能相当程度上多由此而生并为此而服务。如姚金祥在以上海市年鉴为例所作的20年分析中指出,之所以新时期“上海编纂的年鉴,完全靠市场经济自负盈亏、不要国家一分钱的非常少,多数是财政部门或单位拨款”,而且工作成效显著,关键在于其传统“官书”性质和现时资政价值,因而才能引起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②从而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年鉴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也有研究认为,当今年鉴“‘官书’色彩浓厚,民用价值不足”,存在“领导形象稠,官方活动多”“歌功颂德多,报喜不报忧”“百姓形象无,民用内容少”“发行层次高,阅读范围小”等诸多问题。^③对此类认识,不少研究针锋相对:“‘官书’性质不代表年鉴编纂就是为‘官’,即为各级领导服务的。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只是年鉴的功能之一……‘官书’性质

① 颜小忠:《年鉴理论研究存在问题与解决路径》,《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3期。

② 姚金祥:《上海市年鉴编纂二十年回顾》,《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年第8期。

③ 金明德:《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与时俱进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5期。

只是体现了年鉴的权威性。其服务对象并未将普通民众排斥在外,只是与西方一些专门性年鉴不同,它并不是一部专为某一群体提供‘便民服务’的指南。若为了将年鉴推向市场,便一味照搬西方范式,就背离了我国年鉴的本质属性,也丢失了年鉴‘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丢失了我们自己的传统。”^①还有研究进一步分析道:年鉴“得到普通百姓的肯定也很重要。在增强可读性的同时,要把握一个适度的问题,若是过分地强调可读性,把年鉴办成了‘便民手册’,那就是顾此失彼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便民信息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年鉴的时效性本来就无法与互联网相提并论。因此,便民是年鉴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为官方决策才是年鉴的实质”。^②

另有研究则从“规范”还是“创新”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作者注意到,2000年前年鉴界多注重规范,2001年开始则多倾向于创新,而且呼吁效仿西方范式的声音渐多,而忽略了中西年鉴在本质属性、种类及受众群体等方面的差异。如作者发现,有的综合年鉴收录抓眼球的社会新闻较多,进而认为,创新不能背离年鉴的“官书”性质等基本属性。不能盲目为创新而创新。^③

其实,考察所谓“官书”“民鉴”争论时还有一个客观视域和重要节点,即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为边限和标志,此前全国年鉴事业多由出版系统领导管理,因而其改革似更倾向于后者,恰如有学者所言:“面对市场经济改革大潮,言及年鉴事业的未来发展,再以‘官书’自诩,已经于事无补。”有研究提出:“年鉴要进一步发展,靠财政补贴、按机关运作可能不行。年鉴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④但当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并将全国年鉴事业的领导管理体制基本划归地方志系统后,依法编鉴的总要求进一步固化了年鉴(主要是以三级行政区域为主的综合年鉴)的行政特征与地位。因此,如果从综合年鉴和专业年鉴两大分类再来考察,“官书”与“民鉴”的问题似可迎刃而解,即前者应更重于依法编鉴的行政地位,后者则可相对注重面向社会,但两者都应以改革创新的正确导向推进年鉴事业健康发展。

(二) 面向现实与未来的发展研究

与以往相比,研究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年鉴事业才渐入佳境,尤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归属于“地方志”为标志,其后无论是编纂实践还是学术研究,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并与志书编修一样,作为中国地方志事业的两大主业,因而学术界也纷纷将这一时期视为研究重点,但具体分析和相应结论又多有不同。

例如,当中国年鉴事业借改革开放东风快速发展时,肖东发以20世纪90年代为节点,针对此前有人认为经过前期大发展后,此时年鉴事业有所放缓的预判,指出非但“增长速度始终未减”,而且仍方兴未艾,并相应概括了此时10个方面的特点:系列化和网络化,

① 齐迎春:《年鉴编纂规范与年鉴学范式的构建》,《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4期。

② 李智健:《论构建年鉴学的学科体系》,《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2期。

③ 齐迎春:《年鉴编纂规范与年鉴学范式的构建》,《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4期。

④ 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年,第179、184页。

规范化和完善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管理科学化,编印发一体化,特色化和多样化,实用化和社会化,研究深化和培训常态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电脑化和现代化。^①当然这“十化”可能并不平衡,有的尚处于初始状态,有的其后还会产生变化,但应是对其时的一种基本评价和趋势揭示。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肖东发还指出:“在短短30多年时间,我国年鉴事业迈出了坚实的五大步”:始于1980年的“年鉴热”,至1984年“专业化的形成”,自1984年起“地方性年鉴的崛起”,与时俱进的“网络化发展”,以及兴于世纪转换期“数字化年鉴的产生和成长”。^②牟国义也在前述文中,以“从自发编鉴到依法治鉴”,“从一本书编纂到事业全面发展”和“从纸质化到网络化”三句话,对“改革开放时期”全国年鉴事业发展的时代特征作了高度概括。

对未来展望是将其视为年鉴事业全过程有机一体的研究视域,也是业界始终关注的重要命题。例如,在首轮向第二轮修志期转换时,研究就普遍关注了“年鉴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官鉴”与“民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并认为这是事关“年鉴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需要“重新设计、彻底革命”,甚至要进行“第二次创业”。^③

而当第二轮修志结束时,与首轮修志期相比,面向未来的第三轮修志期,年鉴界视野更宽,立意更高,相应分析和举措也更为辩证客观。有学者以地方综合年鉴为例认为:“年鉴编纂总体上尚处于巩固提升阶段,尚处于从解决‘有没有’(数量)到‘好不好’(质量)的攻坚过渡阶段,远未到量多质优、百花齐放的成熟定型阶段。”同时以“全覆盖”的讨论为重点,在点出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的法规不落实、发展不平衡、认识不到位、保障不充分等9个方面问题和相应举措后,强调“全覆盖”仍是今后全国年鉴事业的发展大局和基础底线,必须以依法治鉴的总要求来锚定未来方向,以确保“编鉴”与“修志”一样,作为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两大主业齐头并进,相得益彰。^④这实际说明中国年鉴事业仍处于固本强基的“初级阶段”,从而为未来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坐标体系。

三、年鉴学科的初步构建

作为一种以西方为主的外来文化形式,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年鉴事业起步,在长期的年鉴编纂实践中,伴随着对上述一些基础性重要问题的探讨,在注重借鉴的同时,业界始终在思考具有中国特色年鉴学的构建问题,并取得了富有成效的实质性进展。

(一) 学科建设过程探索

其实,学术界早有对民国年鉴编纂思想的分析,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年鉴学的萌芽。

① 肖东发:《90年代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趋势》,《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肖东发等:《年鉴学》,第142~143页。

③ 张慧珍:《关于年鉴发展趋势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1期。

④ 刘永强:《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方向》,《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2期。

如运子微在相关研究中就曾指出：“20世纪20年代，年鉴业者在重视并充分利用统计年鉴优势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这类年鉴的局限性”，因而“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努力弥补自身缺憾，力求形成自己的特点”。并以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年鉴《中国年鉴》和《中国劳动年鉴》等为代表，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对于年鉴资料的价值判断有了更明确的标准”。作者还从“认识论——关于年鉴的性质”和“方法论——关于年鉴的体例”两方面进一步作了分析，如认为1947年《上海市年鉴》首提“兼以资市通志之取裁者也”理念，“是第一次明确了年鉴为修志服务的编辑思想。而这一远见卓识，正为我们今天所实践中”，从而认为民国“为年鉴编纂理论的形成作了认识上的准备”，故为中国“年鉴编纂理论的萌芽”。^①

不过，如前所述，真正有中国特色年鉴学科的建设探索，无疑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短时期内就能完成学科体系的整体构建，同时对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成效业界也有不同认识。

一方面，从总体上看，肖东发较早认为，以1980年为起始点，与编鉴实践相伴，以其时成立的“中国年鉴研究会”和《年鉴工作与研究》的创刊等为标志，年鉴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总体处于上升态势，6年中年鉴事业便已走过了由“年鉴热”向“专业化”再向“地方化”的三大步。作者还认为，1985年在安徽合肥召开的第二次年鉴编纂经验交流会“直接催生了我国年鉴学的建立”。^②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年鉴学的创建与发展又有三阶段、四阶段等多种说法。王建华的研究同样认为，1984年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全国年鉴编纂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我国当代年鉴理论研究工作正式起步”，因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我国年鉴学已初创，如10多年间仅在《年鉴通讯》和《年鉴工作与研究》等刊物发表的文章就有上千篇。而且，作者还从“总体设计与框架理论”“年鉴条目化”“年鉴规范化”以至“计算机运用”等方面，对学科体系作了初步构想。^③

另一方面，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业界对年鉴学的构建成效大多并不看好。例如，21世纪初许家康便认为，由于建立学科的“描述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都还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基础理论研究尤其薄弱，业界对许多年鉴现象尚未完全形成科学共识，也未产生公认的有强大说服力的理论成果”，因而“严格意义上的年鉴学学科体系至今尚未建立，年鉴学还处于始创和探索阶段”。^④

2009年有研究也认为，“虽说构建年鉴学的学科体系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距离整个体系的完善仍然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制约和限制年鉴发展的几个根本问题，年鉴界仍未达成共识，如：年鉴与地方志如何区别？两者关系如何处理？年鉴应偏向图书化还是期刊化？年鉴应办成官书为官方决策，还是办成便民手册增强可读性？这些根本问题好比是构建年鉴学学科体系这栋大楼的基石……地基没打好，如何能构建年鉴学学科体

① 运子微：《我国早期年鉴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肖东发：《年鉴学刍议》，《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

③ 王建华：《年鉴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发展趋势》，《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2期。

④ 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第2页。

系呢?”^①盛况则在2013年的研究中指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年鉴虽然不是很多,但热衷于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人还真不少,年鉴界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在200篇以上,还陆续出版了好几种专著。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年鉴界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锐减至100篇左右,且有文章数量逐年减少、质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出版的专著更是少得可怜。这与当前年鉴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极不相称。”^②同时,据肖东发对其时所发表的约800篇文章研究发现,真正涉及学术的只占约6.2%。

事业发展至2018年,有研究引用孙关龙关于年鉴能否称“学”的四条标准及相应判断:一是未形成概念体系,二是未建立理论体系,三是拔尖人才已成为学科构建的重大瓶颈,四是缺乏高水平的代表性著作,因此作者依然认为学科建立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③直到2020年,仍有学者视全国年鉴研究长期处于“‘慢作为’阶段……最大问题是概念混乱,各说各话,不成体系”^④。而且这些意见似乎也是业界的主流声音,其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状况可见一斑。当然,学科成立与否并不影响理论的持续探索,同样否认学科成立也并不意味着否认大批学者长期以来所作的贡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再者“主流声音”也并未掩盖其他声音,如肖东发2014年还有“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上我国已走在世界前列”的判断^⑤,从而更显示出我国年鉴学曲线起落式的探索过程和长短并存的复杂格局。

不过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自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将以“地方综合年鉴”为重点的年鉴事业纳入整个地方志事业范畴后,情况开始出现显著变化。特别是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印发后,全国年鉴事业更呈加速发展态势。同样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如2017年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创办的《中国年鉴研究》问世后,立即成为新时期全国年鉴学术研究的主平台。同时,以一批高质量成果和范锐超历年的《国内年鉴理论研究综述》等为标志,它们不仅有效改变了以往的研究状况,而且将在“立足中国年鉴理论研究的制高点,掌握年鉴评价的话语权,引领中国年鉴事业发展方向”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这都是新时期中国年鉴学科建设的强大推力。

(二) 学科体系研讨

判断学科是否建立的首要标准无疑是其体系的总体架构,这是支撑学科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基石。为此早在1986年,鉴于“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的有关年鉴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专著”,甚至业界认为年鉴未必能成“学”的疑问,肖东发便按一门规范学科需由历史、理论和方法诸要素“三位一体”构建的一般规律,设计了中国年鉴学的初步构架(如下)。^⑥

第一章 年鉴:包括定义和性质、种类和特点、职能和作用共三节

第二章 年鉴历史:包括起源及定型、国外发展史和国内发展史共三节

① 李智健:《论构建年鉴学的学科体系》,《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盛况:《年鉴事业繁荣背后的冷思考》,《档案管理》2013年第2期。

③ 周旭:《对我国年鉴学发展的思考》,《中国年鉴研究》2018年第2期。

④ 颜小忠:《年鉴理论研究存在问题与解决路径》,《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3期。

⑤ 肖东发等:《年鉴学》,第3页。

⑥ 肖东发:《年鉴学刍议》,《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

第三章 年鉴事业:包括我国年鉴事业现状、事业特性、各类型年鉴及评议、事业发展规律共三节

第四章 年鉴编纂出版:包括编纂原则、总体设计和框架结构、选材和体例、编排和检索、出版和发行、宣传和利用共六节

其后作者在《年鉴学》(修订本)中,又将这一体系修改扩展为基本理论、发展史、比较年鉴学、编纂工艺学、专门年鉴学和应用年鉴学6个板块。而且长期以来年鉴学界的整体研究与此基本相应,同时在实践中逐步有所发展。

但对这一体系的构建学界显然并未形成共识。如20世纪末王照伦在相关分析中,首先并不认同“年鉴无学”的意见,但又借鉴美国学者库恩的有关学说认为:“一门研究能不能称得上一门科学,关键是要看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研究群体中是否形成了一个‘范式’”,它常常是指某一学科的理论根基,其重要作用在于范例性地指出学科的研究方向、程序、方法和标准等,因而是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作者进而指出,“在年鉴学领域我们还没有这么一个‘范式’”,其时研究也多为“体会或总结,很少能看到提出某种理论,尤其是‘革命性’的理论更是罕见”,因而“年鉴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仍处于原始科学状态,但已经开始了向常规科学发展的进程”。^①与此同时,“范式”构建也成为其时业界判断学科是否成熟的一个热门话题和重要标准。如2011年有研究认为,“年鉴学是否已经形成学科范式?答案是否定的”^②。因此,尽管业界大多认同肖东发等学者所作的积极贡献,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基本范式都未形成一致意见,其框架体系以至整个学科的构建共识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四、结 语

从以上梳理分析可见,改革开放后,新时期年鉴事业实质性起步,在编纂实践和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诸方面,均取得了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发展成就。包括民国年鉴事业虽有不俗业绩,然而对其所作的系统研究同样聚集在这一时期。当然与方志学相似,年鉴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存在诸多问题在所难免。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认识,既反映了学术界实事求是的学风和百家争鸣的氛围,同时也揭示出其学科建设仍任重道远,仍需业界不断为之协同奋力。

如前所述,年鉴既是具有独特规律的一门学科,又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项工作,而且后者同样大有学问。笔者相对只关注了前者,尚未涉及后者。即从“学术”角度看,只关注了年鉴之“学”,尚未涉及编纂之“术”,期望以后能有机会再对后者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以此构建年鉴“学术”的完整体系。

责任编辑:朱海

① 王照伦:《对年鉴学研究的透视》,《年鉴信息与研究》1998年第5期。

② 盛况:《论年鉴学学科范式的构建》,《档案建设》2011年第7期。